



勇敢前進的人生：台灣冒險記1974-2005— 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詹宏志交大演講

Part II：糊里糊塗闖入七○年代台灣的文學核心
文 陳祐如 / 彭城靜

Part I：文化啟蒙自香港

跟著大冒險家去冒險

我今天要做的事跟那天在香港要做的事有點像，就是從外星球來看台灣跟自己，我當然也希望有一點距離，才不會有太多情緒的介入，也因為有點距離，所以我可以看出來那個世界跟更大的世界的關係。我用一本書 [《Return to the Marshes》](#) 來這個比喻。這本書是1977年英國作家Gavin Young寫的，這本書如果翻成中文叫「回到沼澤地」。

本書的開場就是一個探險家開著船來接主角，帶他去一個非常獨特的阿拉伯世界，接下來當然就是一個如夢似幻的旅行讓這個年輕旅行家（主角）大受感動，他回來二十幾年後才寫出這本書來，也讓他下定決心一生要做旅行家。這是一個夢想式的經驗，因為你不是自己去冒險，你是被世界知名的大冒險家帶著去冒險。我好像在說一個聽起來不相干的故事，但我的文學情境與經歷也完全是這樣。

我是國民中學第一屆的學生，所以我是第一屆不用考試就可以上初中的小孩，雖然我的老師還是嚴厲警告我們千萬不要相信國民中學這件事，因為極可能會有變化，有千萬不要因為這樣鬆懈，學校還是繼續補習，大部分人還是繼續在準備，但是我是很高興我本來就沒有要補習的意思，我一聽說不用考試就可以升學，我立刻完全相信，所以我的國小五、六年級是過著快樂的日子。

我們那個時代的少棒是剛剛火紅，我們就是看到了整個台灣棒球世界揚名的一個故事，每個人都受到了激勵，儘管我們沒有手套，我們也要做同樣棒球的夢，這也是我初中最努力想要完成的事，不過我的棒球夢當然沒有完成。

我一直是班上的學藝股長，學校每個班都有訂一本《幼獅文藝》，這是救國團所辦的雜誌，現在回想起來那是黨政不分的歷史，我是學藝股長所以負責保管《幼獅文藝》。《幼獅文藝》當時就是台灣最前衛的文學雜誌，有余光中的詩，朱西甯、司馬中原、七等生的小說，還有偶爾會出現楊逵的作品，當時最前衛、最艱難看到的東西全部都在這雜誌上，有的看的懂有的看不懂，一開始模模糊糊，譬如說七等生的小說，但看著看著就被吸引。我在讀它們的時候，覺得非常遙遠，但我不知道我跟這些事距離這麼近，後來我在大學一年級就進到《幼獅文藝》，各種我以前讀書看到的人，都在那個我工作的那個辦公室出現了。糊里糊塗就進到台北文壇的最核心。

這是一個跟Gavin Young一樣的故事。我在大學這個一年級的寒假，因為沒有什麼錢所以我不想回家，我一個人住在宿舍裡過年，宿舍只有僑生在其他人都回家了。大年初二，有個學長急迫的跑到宿舍去找看看還有沒有人，結果就看到我還留在宿舍，他說有一個救國團的營隊需要一些服務員工讀生，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？我是一個非常窮的學生，有任何有錢的工作我都去，雖然我不知道編輯研習營到底是幹什麼，我也從沒有參加過任何救國團的營隊，但我去了之後才發現他們需要有人帶團康，我其實完全不適合。

於是學長就叫我負責作隊上所有的海報，我很開心，因為我小時候很想要有多多的機會畫畫，可是很困難，我有個很喜歡畫畫的哥哥，一個家庭很難有兩個愛畫畫的，那太花錢了。一直等到我上大學，開始有很多做海報的機會，所以我在營隊的時候就可以不受限制的使用紙，我就想要藉這機會來做一些紙雕作品，做整個營隊的海報全都是用紙雕，這海報一出來，效果顯然是很特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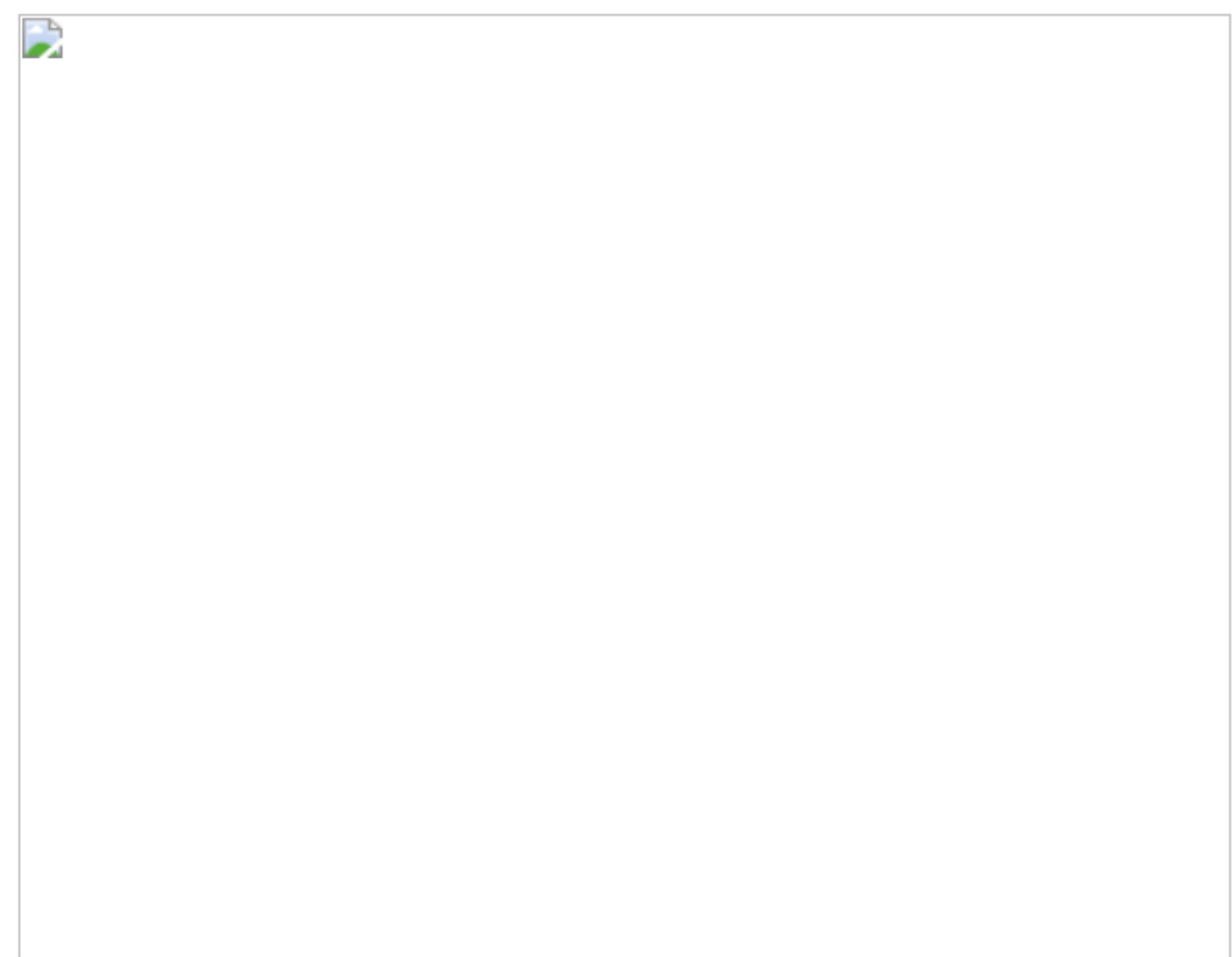
糊里糊塗進到台北文壇的最核心

接著就來了一大作家詩人痲弦先生，他在海報前面站了很久，問同學說這是誰做的海報，他們就把我推出去說是我做的，痲弦先生問了我一些問題，回去之後寫信到我的宿舍要我跟他聯絡，問我願不願意到幼獅文藝做美術編輯接替剛離開的阮義忠，阮義忠先生在當時是一個了不起的插畫家，後來變成台灣最好的攝影家之一，到今天對台灣的攝影界有很大的影響。

我一個大一生就糊里糊塗的跑去雜誌社工作，那是我的學徒時期，我有兩位師父，一位是把我找去雜誌社的痲弦先生，一位是後來籌辦《幼獅少年》的周浩正先生。因緣際會後來我也磨練了一些文字編輯的經驗。有次痲弦先生要我跟著編輯去採訪一位剛從美國留學回來的青年，我們就約在一家咖啡店，做了我生平兩件第一次的事，第一件事是第一次喝到咖啡，第二件事是第一次做了正式的採訪工作，被採訪的年輕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名字—天下雜誌的創辦人高希均，這都是發生在1975年的事情。

過沒多久幼獅要籌辦新刊物叫做《幼獅少年》，主編正是周浩正先生，他是最親近的師父。周先生帶著我從零到有去辦一個新雜誌，我們到處拜訪各種雜誌需要合作的人，拜訪文藝圈的名人前輩，從林海音到後來三毛。

我在當兵前從痲弦先生身上看到了以作家為中心，去思考雜誌如何經營，他要做的工作是如何從每一個不同背景的作家身上認出各種可能性，他會試著把學者類的作家、專家類的作家，把各種特殊經驗的人，設法使他們動腦，讓他們潛在的能力跑出來，這是我在痲弦身上學到的，而且我也學到永不懈怠、不斷的溝通寫信。



1981年6月16日席德進生前最後一次生日宴，高信疆、席德進、痲弦（由右至左）合影。（李賢文攝），摘自 <http://reader.roodo.com/lionart/archives/9237339.html>

跟周浩正先生合作的過程，則是看他怎麼去做一本新雜誌，讓我學會了怎麼樣去考慮一個雜誌的企劃、定位、欄目、雜誌的構思等等，我在九○年代末到兩千年的上半年，七、八年當中我一個人辦了四十幾本雜誌，我是台灣創辦最多雜誌的人，現在7-11看到的雜誌架上可能還有雜誌型的書，大概會有八十到一百的品項，其中大概有一半是我所創辦的。我辦過這麼多雜誌，這些訓練跟思考，都是當時學會的。

一年多以後痲弦先生跑去美國讀書，周浩正先生也離開了幼獅，先在新竹辦了風城出版社，又到台北遠景出版社，他也找了我跟他一起去了遠景，認識了台灣戰後第一代的出版家，看到這些戰後新生代的出版家想要做的事。我大學還沒有畢業時痲弦先生從美國回來到聯合報去編副刊，這是民國67年的事情，我就跟著痲弦先生到聯合副刊。七○年代的文學副刊就是所謂兩大報的競爭，各位看到這兩張照片，左邊就是痲弦先生，右邊就是人間副刊的高信疆先生，中間則是台灣的畫家席德進先生。

為了向古龍邀稿，灌了生平第一瓶Johnnie Walker

七○年代的台灣文學副刊是非常有歷史的時代，也是兩個報社最富裕的時代，那還是一個報紙有管制的時代，不管是執照的管制，連印刷的頁數也有管制，所以如果擁有報紙的執照，而報紙又是受到大家歡迎的報紙，那就幾乎跟印鈔機沒兩樣，富裕的程度今天回想起來還是很驚人，像高信疆先生如果想要海外作家的報紙，他可以打一個國際電話用電話來錄稿，當時傳真機已經存在，但有很多的限制，因此我們是用國際電話錄稿，國際電話的費用可是比我們這些編輯的薪水都還要貴好幾倍。

當時台灣還沒有其他雜誌或反對黨的存在，所以副刊就變成言論意見，因為新聞受管制比較多，但副刊是邀作家寫稿，那時候台灣副刊的心胸是很大的，邀請的作家包含全世界用華文寫的海外作家，這些作家因為不在台灣，不會考慮當時的言論制度，於是副刊就變成言論第一線。有一個故事是我親自經歷的。

當時陳若曦的《尹縣長》出版，那時大陸非常封閉，這是第一次有作家那麼生動的把文革的意識寫出來，陳若曦的《尹縣長》出來的時候轟動全世界，沒多久這本小說也出了英文版，由當時一位漢學家西蒙·雷斯為英文版寫了序，痲弦先生通過管道很早就拿到這個序，也譯成中文，他希望能夠把它刊登出來。

我讀了之後發現，中譯的序刪掉了一句話：「台灣國民黨政府對言論的控制跟他對岸的敵人是一樣的。」我跟痲弦先生建議，要刪就不要登，要登就不要刪，登了刪掉的序一定會被發現反而弄巧成拙，成為國際新聞。我的上司覺得有點道理，但登這篇文章有點風險，所以他就站起來，繞著辦公室邊走邊想，從下午兩點鐘走到半夜一點鐘，最後就打電話回家要太太要幫他準備個包裹。

講這句話是非常悲壯的，當時文字工作者要有一個小包裏，就是牙膏牙刷跟換洗衣物，當你被邀請去談什麼事情，以備不時之需。雖然後來什麼事也沒有發生，但卻造就了那個時代痲弦先生時代的名言：每個編輯心中都有一個小小的緊張。我的母親知道那個風險，她一再告誡我大學馬上要畢業可以找一個正式的工作，意思是要我辭去這個拿著人頭在做的工作。不過也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，我們什麼事都沒發生，我們是跟獨裁者為伍還活下來的一群人，對於一個鄉下的小孩來說，這是一個不斷拓寬看待台灣視野的過程。

當時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有寫過，例如我到副刊時正好古龍小說改編成電影，那是1974、75年台灣最風行的事。有一次痲弦跟我說他曾經邀載過古龍的稿子，但因故主編得罪了古龍，但突然間古龍紅起來了，因為報社給他壓力說大家都在搶古龍的小說，要他想辦法，所以主編把這個工作交給我。我當時就打電話給古龍說我的副刊要邀他的稿子，果然電話的另一頭沉默了一會兒，接著他說晚上在一家餐廳跟幾個朋友吃飯，如果要談稿子的事就來。

大家可以想像我才二十歲出頭，我去了餐廳，古龍看到我就說：「小朋友，你坐下來。」他就從桌底下拿出一瓶黑牌的Johnnie Walker放在桌上說：「年輕人，喝完這瓶再說吧！」我根本不知道Johnnie Walker是什麼，我從鄉下來的知道的事很少，只好用玻璃杯一杯一杯這樣喝，那瓶酒就喝完了，我要跟古龍講話時才發現我的聲音都啞了講不出話來，大概我的臉色也很糟，古龍就把晚宴中斷，叫他的司機開著他的加長賓士車，把我帶上車送我到報社門口，我走下車的時候已經站不住了，他就搖下車窗來說：「小朋友你夠意思，我給你寫稿！」我走上樓，結果倒在樓梯吐了，在那邊躺了一段時間，旁邊有一個掃地的歐巴桑過來說：「年輕人，不要把自己身體喝壞了！」

民國78年我離開聯合報到工商時報去，我當時是想要去做我自己經濟的專長，我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待金庸。那時恰巧金庸要到台灣來訪問，兩報就預備要搶這個新聞，高信疆先生就派我負責去機場接金庸，而且走特別的道路進到海關裡面，就到登機口接了從側門上車，工商時報就把金庸接走了，直到要走那天才放出來，這是綁架金庸的經驗。

這都是台灣七○年代的文學風情，有一點點幼稚，但也是充滿能量的時代，充滿跟社會互動的關係，我就在這裡頭做了大編輯的助理，因緣際會看到了各式各樣的景觀。

在25歲時有四百萬字的文章罵他

我一直都還是一個編輯工作者，一個大機器裡面的螺絲釘，直到民國69年，突如其來的工作落到我手上來。陽地的《爾雅出版社》創辦了年度短篇小說文學選，每一年會挑一個編輯，有一個編輯讀一年的所有發表的短文小說，選出當年度該編輯認為最好的小說編成年度小說選，後來這也變成台灣每年文學的盛事，我的前一任編輯是季季，季季大姊民國69年編完文選後就推薦我去編69年度的，這是個很大的榮譽，我那年才二十四歲，在當時是很難想像的。

我那時候不只編選，也寫了大量評論，而因為在年度小說選的最後一個月，正好也是兩大報文學獎頒獎之際，我當時感慨地想說這些盛會對文學未來的評價會是如何？於是提了很怵目驚心的話，我說台灣作家的作品，在很多年後都可能是邊疆文學，結果闖禍了。

當時台大旁邊的出版社當時小說家東年正在當店長，東年是一個講話很犀利的人，有一天他就指著台灣文學盛會，他認為這以後都是邊疆文學。這是一個把台灣當作大中國的觀點來看待，這個觀點今天看起來還是很怵目驚心的，也就是說你的努力跟你歷史的命運不一定有一致的關係，不是台灣有這麼多的文學活動，就一定有她自主總體性的文學觀，除非她有競爭。我當時把東年的話寫出來，我沒有明確的要站在那個觀點，只是覺得這句話帶有更長遠的提醒，文學評價要看更大的架構來打造。

但是這句話一寫出來就觸動了台灣的文學重要的神經，引發了台灣所謂文學主體性論戰，那一年我才25歲。也因為這篇文章帶給我接下來一連串不同的命運，從那之後我就出名了。我今天說的很輕鬆，當時我內心是很困難的，一打開每本書，都看到攻擊你的文字，這對一個年輕人來講也不是很容易。不過我非常幸運，就在那個論戰起來的時候，我被派到美國去長達兩年的時間，因此等我回來才讀到那將近四百萬字罵我的文章。

初到美國，我做最多的事情是看各種電影，沒想到幾年後，我居然也成了台灣電影的一部分。

